

《淳祐临安志》的卷数和纂修人

陈杏珍

杭州，历史上曾是南宋国都所在地，称临安府。从现存文献看，南宋时期曾先后三次纂修临安府志，后人为了区分这三部方志，分别在书名前冠以修志年号，称为《乾道临安志》、《淳祐临安志》和《咸淳临安志》。这三部方志内容丰富，编纂有体，向为学者所称道，为藏家所珍视。但是，在几百年的漫长岁月里，史籍或佚或散，以至传到今天，三部临安志竟无一完整，给后人留下了大量难以考订的问题。其中，《淳祐临安志》卷帙严重残缺，需要考订的问题颇多。本文打算对《淳祐临安志》的总卷数和主要纂修人问题，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。

在三部临安志中，乾道志和咸淳志的总卷数和纂修人有据可考。关于乾道志，宋代陈振孙在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中就已经著录：十五卷，周淙撰。咸淳志，今有宋刻本传世，虽为残本，但其序言和目录表明该书一百卷，潜说友撰。至于淳祐志，明以前未见书目著录，清代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中，只在乾道志条下附笔说该书为施锜编纂，“世已无传”，卷数则未加说明。清初，季振宜抄配宋刻咸淳志，曾误将淳祐志卷五至卷十杂入其中，后人经考证才予析出。淳祐志自问世直到清乾隆以前，流传不广，由此亦可见一斑。清嘉庆以后，情况有了变化。嘉庆十四年，陈鱣意外地得到了淳祐志残抄

本卷五至卷十,如获至宝,遂与乾道、咸淳二志共藏,目为宋临安三志。宋代地方志保存下来的非常稀少,淳祐志的发现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轰动。一时此书名声大振,藏书家竞相寻访,或赋诗酬唱,或传抄题跋,各家书目也纷纷著录,一些名学者的知见书目和大藏书家的私藏书目对此书都有记载,如阮元《四库未收书目提要》、莫友芝《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,又如赵魏《竹崦庵传钞书目》、孙星衍《孙氏祠堂书目》及《平津馆鉴藏书籍记》、黄丕烈《堯圃藏书题记》、吴氏《拜经楼藏书题跋记》、张金吾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、瞿镛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、朱澂《结一庐书目》、陆心源《皕宋楼藏书志》、丁丙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及丁氏《八千卷楼书目》、张钧衡《适园藏书志》、朱绪曾《开有益斋读书志》、缪荃孙《艺风藏书记》、潘宗周《宝礼堂宋本书录》等,都著录了这部书。诸家著录,使沉隐几百年的古籍得到了应有的地位。今天,我们虽然见不到宋刻淳祐志,却还能见到不少种清抄、清刻残本,这是与清代一些学者和藏家的努力分不开的。

但是,上述书目关于淳祐志的著录,对史料考订不足,互相援引题跋,以至因袭相仍,以讹传讹。关于淳祐志的卷数,普遍认为已不可考,现仅残存卷五至卷十;至于纂修人,或云施愕,或云施鏐,陈鱣、黄丕烈认为当作施愕。虽然其说不一,但分歧也只是在名字的书写形式上。关于施氏生平,则一概说“未详”、“无考”。不仅诸家藏书目录、题记如此记载,就是一些综合性的读书笔记也称之为“施愕(鏐)淳祐志”,甚至连指示治学门路的《书目答问补正》也这样著录。这一传统说法流传之广,影响之大,可以想见。

直到今天,人们仍普遍认为,淳祐志作者是施愕,总卷数待考。全国性的地方志目录也沿袭了这一说法。

关于《淳祐临安志》的卷数和纂修人,《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》提供了新的说法,认为该书共五十二卷,宋赵与夔、陈仁玉纂修。

其依据是《永乐大典》中的一篇佚文——宋代陈仁玉《淳祐临安志序》。为了说明问题，现将这篇佚文摘引如下：

《三辅黄图》之书，所以左右汉史也，近世程公大昌辑《雍录》以广之，而其书始备，是固不无待于后之人也。自古都邑，代各有纪。今通郡国下，至千室之聚，必有图牒。杭为今行都，物聚地大，而登载弗称，非阙欤？窃考国朝宋公敏求尝作《东京记》，今披而观之者，如身游其间，可谓盛矣。至若古杭有志，自宋刘道真作《钱塘县记》，而祥符旧经，未详何人所作，班班尚可考见，而成书亡矣。乾道初，府尹周公淙因祥符之旧，始为之志，而疏略特甚，八九十年间，无复訾省。迺皇上御极之二十六载，资政殿大学士赵公与憲尹鼈京国亦既十年，百度鼎饰，政通教行，顾念图牒散落，心焉陋之，惧非所以尊崇宸居，宣示罔极，惕不自宁，首命通判府事吴君革、府之贤僚若士，薈叢其事。间一岁，吴君适迁官未克就，乃命通判府事王君亚夫典领之，即仙居山中，俾仁玉与纂辑焉。谗闻陋识，弗获控避，于是晝访夜思，参以书传所省忆，耳目所覩记，得古今事迹千数百条，鼈为门者十有二，为类者九十有九，为卷者五十有二，总之数十万言，亦略备，微文碎义，弗可殫举，而疑可稽，阙可补之，大者輒哀著之，又因记赵公述作之本旨，以竣后之君子。淳熙（当为淳祐——引者注）十年，龙集庚戌，十二月壬辰朔，天台陈仁玉谨叙次颠末附于诸序之后。（见《永乐大典》卷七六〇三“杭”字韵）

在《永乐大典》中，淳祐志与乾道志、咸淳志处于同等的地位，引文时常并提。这一情况说明，淳祐志当时尚存于内阁大库中，临安三志是并存于世的。国内现存淳祐志残本，已佚陈仁玉序。《永乐大典》中幸存的序文，为我们研究淳祐志提供了宝贵而可靠的资料。

读陈仁玉序，可以明瞭几个问题：

一、纂志“本旨”：杭州是当时行都，还没有一部与它相称的地方志（“登载弗称”）。杭州古志，当时已经亡佚。周淙纂修的乾道志又过于粗略（“疏略特甚”）。为了“尊崇宸居，宣示罔极”，需要编纂一部新的临安府志。可以推断，这是一部官修的方志。

二、纂志时间：自宋理宗在位二十六年（“迺皇上御极之二十六载”），即赵与夔知临安府第十年（“资政殿大学士赵公与夔尹釐京国亦既十年”）起，过一年（“间一岁”），至宋理宗即位二十七年（“淳祐十年，龙集庚戌”）修成。

三、卷帙规模：“得古今事迹千数百条”，总为十二门，九十九类，五十二卷，共“数十万言”。

四、纂修人：赵与夔首命吴革等“薈蓂其事”，继命王亚夫“典领之”，“俾仁玉与纂辑焉”。也就是说，赵与夔修，陈仁玉等纂。

赵与夔《宋史》有传，称赵与夔字德渊，宋太祖十世孙，居湖州，嘉定十三年进士，累官淮浙发运使，差知平江府，特转两官，致仕，景定元年八月卒，特赠少师。“所至急于财利，几于聚敛之臣矣”（见《宋史》卷四百二十三）。

《南宋经抚年表》记载：赵与夔于淳祐元年以检正除司农卿兼知临安府，至淳祐十二年正月二十八除绍兴。

陈鱣指出：淳祐志中备载赵与夔建置仓敖、设育婴堂、濬西湖、开运河诸善政。而卢熊《苏州府志》称其知平江，适郡中饥，分场设粥，全活数万人；再守郡，行乡饮射礼于学宫，复修饰殿堂斋庐，广弦诵以严教养，弟子为立生祠。熊之言当有所受，则志亦未必虚誉，兼可以证史传异文（见《丽宋楼藏书志》卷三十）。

关于陈仁玉，《南宋馆阁续录》记载：陈仁玉字惠公，台州人，习《春秋》，开庆乙未（当为己未——引者注）赐同进士出身，九月以军器监丞兼国史实录院校勘，除兼国史院编修、官实录院检讨官，兼崇政殿说书，十月兼权礼部郎官，十一月除直秘阁、浙东提刑、兼知衢州（见《南宋馆阁续录》卷八）。其著作有《菌谱》传世。

历代编纂方志，有一个重要目的，就是供行政长官鉴览，以为施政参考。我国古代的方志大都是官修的，通常由地方长官主修。《乾道临安志》纂修人周淙，乾道三年起知临安府。《咸淳临安志》

纂修人潜说友，咸淳四年起知临安府。淳祐共十二年，赵与簠自淳祐元年至十二年知临安府，最具备主修临安志的条件。今存《淳祐临安志》残卷，纪事时间截止于淳祐九年（一本截止于淳祐十二年），纪人物截止于赵与簠，与陈仁玉序修志之年基本吻合。阮元指出，今残本淳祐志，“所存唯城府、山川二门，前有总论一篇，异于他志。其叙城府一：首城社，次宫宇，次旧治、古迹，次今治、续建，为第五卷。城府二：首学校，次楼观，次园馆，次厢隅，次军营，为第六卷。城府三：首坊巷，次界分，次桥梁，次仓场、库务、馆驿，为第七卷。叙山川一：首城内诸山，次城南诸山，次城西诸山，次亭馆，次古迹，为第八卷。山川二：首城东诸山，次城内外诸岭，次诸洞，次诸石，次诸坞，次峪、衢（一本作“衙”——引者注）、关，为第九卷。山川三：首江，次湖，次河渠，次山闸，为第十卷”（见《四库遗书目录提要》）。从残存篇目看，这是一部具有相当规模的方志，又是都会志，若没有官府主持，要纂修成功是不可能的。由此看来，陈仁玉所叙《淳祐临安志》，当即今天传世的《淳祐临安志》。清代仁和人胡敬，曾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录《淳祐临安志》，分编为十六卷。光绪年间，丁丙得此书残抄本，分编为八卷付刊，收入《武林掌故丛编》第二十四集。胡敬辑佚本的传世，也为考订淳祐志提供了佐证。

施谔，《宋史》无传，字号、里贯均未详，其著作未曾见于著录。认为淳祐志为施谔纂修的主要依据是《万历杭州府志》。其卷五十三“艺文上”著录：

乾道临安志十五卷	周淙撰
淳祐临安志	施谔撰
咸淳临安志百卷	潜说友撰

这里，乾道、咸淳二志有卷数有撰者；淳祐志有撰者，但未著录卷数。

明代曾数修杭州府志，《成化杭州府志》的纂修者夏时正在序

中说：“嗟乎杭之地志，修于潜说友，再修于徐一夔，再修于永乐、景泰间。”事实上，“杭之地志”并不是始修于潜说友，只是因为成化年间修府志时没有能够见到比潜志更早的乾道志、淳祐志，于是只得“命郡中一二文学，采摭旧志（即明修诸志）暨宋咸淳志并今所得传闻成书”。到万历年间修府志时，也只能依凭明修方志及《咸淳临安志》。万历七年徐枋序中就曾慨叹，“文献不徵，空言亡补”，“今蒐摭散佚于兵燹之后，百年之外，故老遗书，仅存什一，一旦濯新耳目，足称文献，岂不为尤难哉”！万历府志的编纂者并未见到淳祐志，书中也只称引咸淳志及明修诸志，当时文献又缺乏，显然，以万历府志作为考订淳祐志的依据是不妥的。

认为淳祐志纂修人是施谔的另一依据是杭世骏、厉鹗《咸淳临安志跋》。杭世骏、厉鹗交往密切，都曾为《咸淳临安志》作跋，为说明问题，剖析杭世骏一个人的跋文就可以了。杭世骏跋文，只是对咸淳志作一般介绍，并未把注意力放在考据上，正因为如此，文中明显地存在着错误。这篇跋文介绍咸淳志，称“碑刻七卷，仍阙如也”。实际上，所缺的七卷是：卷六十四至六十六人物，卷九十、九十八、九十九记遗中之纪事纪文，卷一百记遗中之历代碑刻目。黄丕烈就此发表评论，指出所谓“碑刻七卷，仍阙如也”的说法，“未免考之不审尔”（见《道古堂文集》卷二十六及《堯圃藏书题识》）。杭世骏跋文中确曾提到“施谔淳祐志已佚不传”，但是，这篇为咸淳志作的跋文尚且错误介绍了咸淳志，足见其不是以考据为重点，那么，跋中关于淳祐志编纂者的说法，也就不足为凭了。

一部方志，常常由许多人纂修，生平无考的施谔也可能真是淳祐志的编纂者之一，但是在文献不足徵的情况下，著录中可不予反映。而陈仁玉序则应作为考订淳祐志著者和卷数的主要依据，因为它比《咸淳临安志》的引文、《万历杭州府志》的记载以及杭世骏、厉鹗的跋文更直接，因而也更可靠。